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亞洲」的記憶／技藝：張承志《敬重與惜別—致日本》讀後

The Arts and Memories of "Asia"

doi:10.6752/JCS.201109_(12).0005

文化研究, (12),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 2011

作者/Author：林淑芬(Shu-Fen Lin)

頁數/Page：94-10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5](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亞洲」的記憶／技藝： 張承志《敬重與惜別——致日本》讀後¹

The Arts and Memories of “Asia”

林淑芬

Shu-Fen Lin

時值21世紀險惡降臨的今日，塵封日久的亞細亞主義，是否還能被發掘出新的含義？

是的，不單唯獨今日，亞細亞夢想永遠都在不遠前方，引誘和勸說著，不斷閃幻出魔性的光彩。

……在新的時代感召之下，謀求亞細亞諸國之間，以及亞細亞與整個第三世界的互助、支援與同盟的聲音——又漸漸響亮起來。

——張承志(2009: 265-266)

一、前言

接連閱讀幾部中國作家、學者關於「亞洲」問題的作品，感受極為複雜。一會兒彷彿深受啓發，靈思泉湧而興奮不已；另一會兒卻又陷入茫然、失語的狀態，而感到難以爲繼。

孫歌的〈歷史中的亞洲論述與當下的思想課題〉這篇由上下兩

1 感謝交大社文所劉雅芳組織張承志讀書會以及中研院歐美所王智明籌辦此次小型工作坊。小型工作坊主持人陳光興與兩位回應人藍弘岳、汪宏倫提出了許多極具啓發性的問題，在此一併致謝。不過由於各種主客觀的限制，本文大體上仍維持工作坊當日發表的版本，僅針對某些段落與字句進行小幅度增補。工作坊諸君提出的問題，特別是陳光興所提醒的陳映真的亞洲主義以及陳光興多年來針對東亞／亞洲的諸多論述實踐，不是這篇當時在特定的閱讀脈絡中寫就的簡短心得所能涵蓋，期待日後更有餘裕再行回應。

個部分所構成的長文，是一篇深入日本明治以來直至20世紀90年代亞洲論述的系譜研究。孫歌對於日本思想史的熟稔及其縝密的分析與犀利的批判視角，使我在試著理解「亞洲」作為一個問題意識如何在不同世代的思想人物²各自所處的歷史情境中被發想、交會、分歧、斷裂、延續以及挪用、接收的動態過程的同時，也體會到孫歌所說的「整體架構」，亦即「在歷史人物的內在矛盾以及歷史人物與他的時代之間存在著的緊張關係當中，提煉出不可視的思想史要素的過程」（孫歌 2009a：4），對於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孫歌也提醒我們，若要真正地與思想人物遭遇，就必須放棄套用既定的概念架構去「回收」思想史要素。或許可以這麼說，要進入一個思想場域，必須先學會去熟悉化，才有可能翻轉既存之「可視與不可視」和「可知與不可知」的架構，也才能真正彰顯「思想史」研究的思想價值與時代意義。但其困難，不在話下。在文章的最後，孫歌提出了如下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似乎也說明了孫歌研究此一課題的出發點：

或許在當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亞洲究竟意味著什麼？而為了有效地思考這個問題，必須面對的是前人的摸索、實踐，特別是失敗。或許日本關於亞洲論述的傳統並不能直接成為東北亞其他區域的思想資源，但是，日本迄今為止在亞洲論述這個思想課題的實踐上提供的經驗與教訓卻應該被共享……並不能把亞洲論述特別是東亞論述天然地作為自己思想課題的中國知識分子，也許有必要歷史地審慎追究：就我們的歷史而言，亞洲論述究竟有什麼可能性？（孫歌 2009a：236）

孫歌提問的問題，在台灣的我們是否要回應，可以如何回應？

汪暉的《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敘述》則是環繞著「如何詮釋中國及其現代」這個問題，開展他對於亞洲想像的探索。在其中，汪暉一方面處理不同視野中的亞洲主義與現代性中民族國家形構和資本主義體系各自的賭注及和兩者脫離不了干係的殖民主義與戰爭的複雜糾結，並且在質疑民族主義知識架構的同時，重新思考朝貢體系理念、

2 文章中討論了福澤諭吉、岡倉天心、和辻哲郎、竹內好、梅棹忠夫、宮崎市定、高山岩男、溝口雄三、濱下武志以及山室信一等人。

運作及其在「亞洲」問題上的意義。另一方面，汪暉分析了至今未曾結束的東亞冷戰格局與當前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其中因現代化過程內外交迫的作用所遺留下來的諸多未決區域，例如：西藏、琉球、台灣（台灣並非此書討論的重點）。最後，則提出一種超越民族－國家思考格局的「跨體系社會」研究方法與政治性思考……

閱讀張承志的《敬重與惜別——致日本》，則是一次截然不同的經驗。這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既不是思想史、論述史的研究，也不是政治史或典型區域史的研究。然而，這本表面上看起來極為個人的散文集，卻讓我在先前交大的讀書會中半開玩笑地說，「閱讀這本書，不論在知性或感性上，都有點難以承受」。知性的難處，比較容易說明，其實就是困窘於自己對於與台灣處境密切相關的中國與日本近代歷史的認識不足。感性上的難，則複雜一些。最初應是有感於作家為其所選擇的書寫位置的艱困與所須投注的心力之龐大。作為一名中國文革時期「紅衛兵」發起者之一以及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中國作家、學人，張承志藉由其親身的經驗與觀察，以兼具抒情與論理的文字，追索在明治近代國族打造及與之並行的「脫亞入歐」、「亞細亞主義」的想像與實踐當中，日本如何從被侵略的危機感轉而投向侵略擴張的行列，以及此過程中所矛盾感知的中國。張承志也呈現了一部分日本人在戰爭慘敗之後，反省、凝鍊而成的對於世界和平的承諾及對於正義的熱烈追求。張承志被其中所暗示的一種反對侵略擴張、聯合受壓迫者的亞細亞主義精神所打動，也對於正義與和平之間時有齟齬悖逆的困頓處境感同身受。

在一次次與日本民間友人的偶遇、交往與相知相惜，及對日本知識分子與民衆寄予的期待與獲得的慰藉、失望和啓發中，張承志念念不忘的是對於中國人必須自省的提醒：那是對於大國主義的棄絕，對於和平、正義的堅決承諾，對於他者痛苦的共感，對於人類寬容、共存的信念。在21世紀初，面對中國過去一世紀以來經歷侵略戰爭、革命動盪與改革開放，而今不論是被賦予的或是自我認同的「大國崛起」，如此繞道日本而提出的深切提醒與其中承載的對於中國、對於日本的交錯情感，不是一個容易的書寫位置。而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這樣的書寫也促使我再次體悟到書寫他者或與他者遭遇，特別是

造成自身傷痛的他者的難處：如何能在感受到自身傷痛的同時，對他者保有耐心、開放性乃至適時沈默的可能性？如何作到不那麼焦急於伸張、捍衛自身，不那麼腆於承認曖昧，也不那麼恣意評判與結論，極其不易。但是，對於他者，對於異質性的尊重，卻也不能總是流於宣稱。

我沒有日本近代史或戰後史的研究背景，對於張承志書寫所涉及的歷史事件與論述場域，我無法站在斟酌對錯的位置上進行討論。我們或許可以很容易地指出這本書明顯不夠周全之處，諸如對於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及沖繩復歸、修正主義史觀與戰爭責任等爭議所揭現的日本社會的情感與知識結構等問題，皆未著墨。此外，我們或許也可以將之置放在當代中國亞洲論述的知識脈絡中來加以分析理解。不過，這亦非目前的我能力所及。我更不確定自己能否針對王智明設定的「感知亞洲的可能方法」，提出什麼深刻的見解。即便如此，這本書的內容，於我而言，仍舊太過豐富，我無意亦無力於逐篇討論或深究所有的議題。我想試著談談書中最吸引我的民衆的位置，還有我自己的失語問題。後者，很明顯地，與在台灣閱讀的位置有關。

二、民衆史

必須要先說明的是，我所指的「民衆」不是單一同質的集體，也因此所謂的民衆史，自然不會是從單一的觀點或立場出發所進行的歷史書寫，而是基於對「民衆」本身駁雜、難以被完整統合之特性的認識而開展的一種多重書寫。在這樣的書寫中，我們或許才能真正把握思想與行動的主體作為「歷史中的主體」，在構成歷史情勢的多重決定牽制中各種動態的生成與變異的意義，同時，我們才能更謹慎地使用諸如「全體民衆」³這樣的說法。

3 此處「全體民眾」的說法來自於汪暉討論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參見汪暉(2010: 28)。

前面說到《敬重與惜別》不是嚴格的學術作品，書中使用較多篇幅討論的人物，往往也不是動見觀瞻的思想家或定奪決策的政治人物，而是在歷史與思想洪流中具體行動的個人或人群。就本書所探討的亞細亞主義而言，他們雖不是亞細亞主義作為思想論述的創建者或者作為某種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者，卻是亞細亞主義的認同者與力行者。然而，也就在此，我們看到了認同與行動在活生生的人們身上可以展現出多麼難以預測的不同樣貌。我不想提議一種思想者與行動者之間的截然二分，但是，我的確希望能夠凸顯思想、意識形態與行動之間各種錯位的可能。各種思想或意識形態內部本來就可能有許多矛盾、跳躍與難以完全證成的預設。而即使試圖排除這些問題，例如以各種方式遮掩矛盾、空隙而讓自己呈現為一套完滿的體系，思想或意識形態也很難成為行動的「直接」綱領。我以為那是因為受到召喚或主動投注、認同的主體與思想和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更多難以完全彌合的空隙。要強調的是，這麼說並非浪漫化民衆，而是一如孫歌所言：「民衆視角提供的思路，是把這一切都在顛倒的世界裡相對化之後，再重新作為要素組合進歷史中去，只有在這個階段，虛假的二元對立不再具有意義，而錯綜多樣未必可以簡單整合的歷史過程，才能呈現它的豐富性格」（孫歌 2009b）。由是，在張承志的書中，亞細亞主義，是侵略擴張的遮羞布，也是抵抗的宣言書；是國家戰略，亦是民衆思潮。我們無法提綱挈領亞細亞主義的面貌，只能一點一點地細心編織。

重重曖昧體現在書中的各個人物身上。我們讀到了一位十七八歲時受到大亞細亞主義感召在滿洲國邊界實現其以日本為中心，戰勝白人、脫離中國夢想的前關東軍情報員或「原右翼」狂熱青年，50年後成為在青海貧瘠村落的低調鄉村教育家（服部幸雄）。我們也讀到了為了藏匿來自印度的志士，而與政府作對，在張承志眼中「代表了相當多的普通日本人，對軍國擴張途中的亞細亞解放輿論，弄假成真、身體力行」的相馬愛藏與相馬黑光夫妻。相馬夫婦、服部幸雄或者熱烈支持孫中山反清革命的宮崎滔天，被張承志視為一般民衆的「心情的亞細亞主義」，或者「真誠的亞細亞主義者」（232-248）。張承志

說，「這種懵懂的反骨和傾向，或多或少，與反對白種人的殖民擴張有關」(235)。而此一在關鍵時刻看重社會正義更甚於法制的普通人，似乎早已出現在江戶四十七士的故事中。四十七士的故事對張承志而言的意義，既不是明治之後所賦予的忠君形象，也不是福澤諭吉所說的「身居國民地位，不顧國法之重」的暴民，而是一種「士」在盡忠的同時，實現「義」、「殉」和「叛」，「為公理是從、劍隨時威脅君王」的布衣精神(169-170)。張承志所描寫的60、70年代的安保鬥爭與阿拉伯赤軍連的激進行動，似乎也就是被放在這樣一個反叛的傳統中來加以理解的。

不過，張承志也在李鴻章馬關條約談判過程遭刺事件中，注意到另外一群同樣反骨、同樣自覺「匹夫有責」的人：

……被軍事勝利煽動得幾乎瘋癲的日本人，熱望繼續擴大戰爭，把皇國神威一直發揮到天涯地角。他們居然不覺得戰爭帶來的衰竭疲敝，生怕春帆樓和談成功，唯恐事態就此罷休。這種為繼續和擴大戰爭立志干涉國政的狂熱國民，即便在全世界也是罕見的。他們藐視法度，結社營黨，不接受政府約束，恣意挑動事變。(37)。

而玄洋社的頭山滿，甲級戰犯大川周明、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川島浪速等被張承志大致歸類為「行動的亞細亞主義者」，則是「即便確有對弱小各族的款款衷曲，更鼓譟著挑動邊疆各族反叛、破壞中華帝國大一統的轟隆鼓聲」(253)；試圖以一種霸道、具有攻擊性的「己任」姿態，正當化其侵略的行動。而我們也不要忘了以正義之名所行使的抵抗或反叛，也不見得可以避開淺間山莊的暴力事件，或者以解放之名所發動的流血攻擊。

我想正是因為避免浪漫化、絕對化民衆，甚至避免浪漫化、絕對化抵抗，所以張承志才有如斯感嘆：

不盡的悲劇一直在說：激進的革命思潮，只能導致非合法、暴力、炸彈，它是一條無望的絕路。所以，抗議和反體制的傾向，是不可取的……究竟是否存在——以「和平」為手段執行的「正義」呢？和平主義的、非暴力和拒絕流血的道路，它存在麼？究竟為什麼，和平與正義這對孿生的姊妹，卻像是相悖的分歧？(135)

張承志提醒我們甚至不能執著於對於反抗或反抗者的單一理解。當60年代極具代表性的民謠抗議歌手岡林信康不顧聽眾要求，拒絕演唱抗議歌曲的時候，意味著什麼？是不願再提陳年舊事，是無法始終如一堅守反抗的位置，還是爲了尋求藝術上更大的自由？岡林信康所拒絕的是什麼？

我想，在我們討論知識分子思想文本中亞細亞主義的「亞洲」究竟是一個實體或一個符號，是一個文化、文明、區域、風土的範疇，抑或政治意識與自覺⁴，或許捲入這場思潮之中的諸多行動者，不論是菁英階層，或是一般民衆如何形成了自己的主體認同、感知與慾望結構，如何將之轉譯爲各種不同的實際行動並且產生了哪些具體後果，可能是我們在反省亞細亞主義時無法跳過或簡單分類處理的。我們如何書寫在既同且異的歷史處境中，彼此爭鳴的思想與情勢判斷以及與此相應的種種主體（位置）的生成與轉變乃至消逝？如何可以不採取菁英啓蒙的觀點來檢視民衆的位置或者民衆在思想改造與行動中的成敗？我以爲，《敬重與惜別》示範了一種可能。

三、台灣的位置

不論是《亞洲視野》、《敬重與惜別》或孫歌的另外一篇〈東亞視角的認識論意義〉中，台灣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及。汪暉論及台灣的部分，主要是在該書討論琉球戰爭記憶與社會運動的章節中。他試圖從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分析歐美國際法及其預設的國際政治架構在亞洲成爲新的知識框架的過程，他也試圖以台灣作爲沖繩社會運動的對照：

台灣早期的族群政治與台灣社會的民主問題有密切的關連，早期的民進黨有左翼的傾向。但是，當台灣的族群政治蛻化爲典型的民族主義運動和身分政治的時候，本地

4 此處關於「亞洲」作爲一種政治意識或政治自覺說法來自於汪暉(2010)，將在下一節討論。

人、外省人這類論述就完全兩極化，也就是去政治化了。這一方面是在民主運動的去政治化，一切社會問題都被組織在族群對立和兩岸對峙的框架下，從而政治空間無法展開；另一方面又是對近代帝國主義創造的民族主義邏輯的複製。就我所接觸到的琉球運動而言，他們在這點上非常不一樣。(192)

不管它的鬥爭目標是什麼，不管琉球社會運動內部包含著怎樣的複雜性，這些社會組織的根本出發點在於賦予當地人民自治的能力。這使得當地的社會鬥爭與琉球社會主體的創造密切地關連起來……在今天，任何社會鬥爭都不能離開特定的社會身分，但如果將身分＋政治僅僅局限於民族主義身分政治，又會產生新的扭曲——台灣的身分政治所產生的社會分裂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234)

在《敬重與惜別》中，張承志討論的則是作為東海重要門戶之一的台灣：

如果沒有鄭成功的掃蕩，東海的形式不堪設想。不能想像台灣是一座歐美帝國主義的移民島，如一個東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脅朝鮮、日本、中國。

無論如何，在東海——及朝鮮半島、日本、大陸東海岸、東海諸島、台灣——這一東亞的心腹海域，歐美的殖民主義未能插足。它們可能完成的全球鍊接，被鄭成功一劍斬斷，一把火燒了。

……

田川福松也好，國姓爺也好，鄭成功乃是為東亞、為東海，為一個古老的傳統收復了台灣。這個傳統，不願被白種殖民主義所覆蓋，不願被洋人的價值所否決。鄭成功所完成的，驅逐殖民者收復台灣島的意義，要在更寬廣的視野和更大的時代來臨後，才能總結。

……

如鄭成功的故事喻示的一樣，從長崎到台灣，甚至還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島、南至菲律賓的一道海域，看作一個單元。這就是東海。海中散布的島嶼和半島：朝鮮、九州、琉球、台灣，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順、釜山、泉州、上海，天生處於微妙的政治地理環境之中。(60-61)

我之所以要長篇引用以上這些段落，主要是想要點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亞洲論述中台灣被擺放的幾個位置。首先，中國曾經在東亞建立了一套不同於歐洲民族國家國際關係的政治秩序，在此政治秩序

中，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為何？汪暉以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時主張台灣為「無主之地」台灣生番為「化外之民」挑戰清國對於台灣的統轄權為例，說明受到西方民族主義影響而在戰爭中援引萬國公法的日本，刻意漠視或者企圖瓦解清代中國內部多重的法律與政治—文化關係。汪暉也引用了蔣介石日記等資料說明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對於台灣與琉球定位的差異：台灣、澎湖與旅順、大連等被日本占領之地，必須無償歸還中國，而琉球則劃歸國際管理或非武裝區域。對汪暉而言，蔣介石所表達的其實就是對於前述中國政治體系內部統治關係多樣性的理解：台灣屬於中國直接行政管轄範圍，琉球與中國之間則是一種朝貢關係，而這種多重的關係與清末以來中國被迫接受的民族國家的主權邏輯顯然不同。(202-230)

其次，台灣在甲午戰爭之前及至冷戰時期或所謂後冷戰時期的戰略地位。簡單地說，台灣曾經扮演了截斷或至少延宕了歐洲殖民主義插足東亞企圖的角色，也是日本蠶食中國的重要序幕，更是冷戰時期延續至今作為美國亞洲圍堵政策「第一島鏈」，其實也就是張承志所說的「天生處於微妙政治地理環境中」的「東海」諸島的關鍵。易言之，台灣既是自17世紀以降歐洲、日本、美國帝國主義相繼覬覦中國、亞洲所建立的灘頭堡，也是當前亞洲特別是東亞衝破帝國主義的重要據點。

以上兩點似乎便足以說明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台灣跟亞洲或東亞之間的獨特淵源。台灣所處的位置正是各個帝國碰撞角力的邊緣，但也正是因為地處邊緣，所以在很多時候，台灣同時具備作為這些帝國的內部與外部的雙重特性。這樣的雙重性或曖昧性，在讓台灣周旋於這些帝國之間，遭受這些帝國夾擊或「支援」之外，是否也在台灣孕育了思考和想像與台灣緊密連帶的亞洲／東亞的根苗？前述所引汪暉的討論，似乎便是對於這個問題的一種答案：台灣尚且在複製民族國家的架構，顯然沒有開創出具有政治性的亞洲視野，因而與他所理解的琉球社會運動相去甚遠。至於台灣為何至今仍舊充滿主權慾望？為何沒有辦法開創出具有進步性的政治空間，汪暉尚未提供細緻的觀察

或分析⁵。

的確，若以二次大戰為分水嶺，我想不論是戰前或戰後，上述問題的答案恐怕都不是那麼地確定。就我所知，目前針對日治時期台灣的亞細亞主義或者亞細亞主義中的台灣的研究文獻並不多，但是從既有的文獻中，的確可以看到一些當時受到日本亞細亞主義影響或吸引的台灣知識分子的身影。然而，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中提出或接受亞細亞主義，他們如何理解、闡述、實踐亞細亞主義？亞細亞主義是作為一種抵抗殖民的自治主義、國際主義或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盟友，或是作為日本同化運動意識形態的一個環節？殖民者的亞細亞主義與被殖民者的亞細亞主義之間，有多少動員與認同？又有多少的抵抗對話？‘有多少知識分子投入，有多少身體力行？是弱者的武器或者強者的邏輯？還是與日本亞細亞主義一樣地多元紛雜？這一切都有待更多的探究。但是，無論如何，日治時期台灣的亞細亞主義，不論其是否曾經成為一股思想上的潮流，一個合理的判斷是，其與當時台灣知識分子與日本乃至中國知識分子的接觸交流有關。

無論如何，如果亞細亞主義曾經出現在殖民時代的台灣知識界，那麼，隨著日本殖民時代的結束及之後國民政府因戰敗流亡來台，在「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與「台灣是東亞的反共堡壘」等政令宣導之外，亞細亞主義已經消失殆盡？消失的原因是因為亞細亞主義僅是殖民者的遺毒而必須被清除，還是因為亞洲主義的理想被淹沒在戰後追求民族自決的激揚聲浪中？是因為台海對峙，抑或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在美國亞洲地區軍事重新部署中，台灣對美國的依附關係更為徹底⁷，而這種徹底的依附與亞洲主義對抗西方帝國主義

5 此處，我想引用孫歌的一段話：「由於大陸知識界對台灣的這些複雜課題很少進行內在理解，關注的熱點基本上集中在統獨問題上，致使台灣在東亞的特殊定位被忽略，也使得大陸知識界很少關注台灣如何建立（或者為何難以建立）東亞視角這樣的問題。」（孫歌 2008：227）

6 關於這個問題，感謝交大社文所藍弘岳提供的一些想法。

7 1948年美國與國民政府簽訂的《中美經濟援助協訂》中，將一部分的援華款項撥給台灣使用。但是在韓戰之前，美國已經停止了對華援助。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改變其對韓國與台灣的政策，恢復對台灣的美援一直到

airiti

的初衷背道而馳？我們不禁要想，冷戰時期的台灣，想像亞洲的條件與必要性是什麼？為什麼要想像亞洲？可以想像連結的亞洲是什麼？如果在台灣想像亞洲是為了追求和平、正義、自由、平等、解放等價值，是哪些力量阻礙了這些價值的實現？是殖民台灣數十年，將台灣捲入東亞戰爭中，且對戰爭責任仍然交代不清的日本？是對岸的共產中國？是造成二二八事件與厲行白色恐怖的國民政府？抑或是扶植國民政府成為冷戰一員的美國？台灣與中國、日本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是否真的可以僅僅只是從美國在亞洲所設下的冷戰格局加以理解，並以對抗美國帝國主義霸權作為最大的公約數？我彷彿在張承志的書中，讀到了如斯暗示。⁸

然而所謂的冷戰畢竟不是一個內容一成不變持續半個世紀的超穩定結構。事實上，從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冷戰經歷了不斷重整的過程。我們當然無法否認美國在其中所扮演的主導角色，但是，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一連串造成結構中不同位置各自內部與彼此之間關係持續調整的事件：萬隆會議、安保鬥爭、越戰期間的反戰運動、中國文革、沖繩復歸、釣魚台事件、中日關係正常化、台灣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等等。在這之中，各種不同的連結、衝突、對立與合作持續進行與轉變，國內事件與國際事件交織一片。其中，我們的確看到了不同國家內社會運動的相互參照，也可以看到「亞洲」或「第三世界」的連結成為一種思想資源，但是，我們得要承認的是，不論亞洲或第三世界，幾乎從來就不是追求解放的運動的唯一思想資源。

1965年結束。在這段「美援依賴」期間，美國對於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乃至社會、文化生活的影響，甚為深遠。雖然美援在1965年便停止，但是實際上停止的只是經援部分的開發貸款與贈與。1951年5月成立的「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美軍顧問團）一直到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之後，才停止運作。台灣與美國於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美菲共同防禦條約》（1951）、《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3）、《東南亞共同防禦條約》（1954）和《美日安保條約》（1960）共同串連而成美國在亞洲的一道綿延的防線。

8 張承志在書中關於美國帝國主義問題的討論，很大一部分是與美國的中東政策有關。

回到當前，不論我們說它是後冷戰時期，或者是從未結束的冷戰的延續，我們所處的是一個世界局勢劇烈重整的時代。如果在當前我們要想像亞洲或東亞，我們似乎還是得問這個想像裡的共同基礎是什麼？是共同敵人、共享的價值，還是對於共同處境的普遍認知？是否得要在形形色色的壓迫之中，指認最終的壓迫根源？但是，如果壓迫往往來自多重的根源，不同的壓迫之間可能相互衝突而無法建立連結，而事實上跨越東亞與亞洲的連結也從未停止發生，那麼，我們需要更充分地說明在當前，亞洲或東亞想像的迫切性與針對性，同時也誠懇地分析此種想像的局限。

引用書目

- 汪暉。2010。《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敘述》。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孫歌。2008。〈東亞視角的認識論意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七十期，頁213-244。
- 。2009a。〈導言：與思想史人物「遭遇」〉、〈歷史中的亞洲論述與當下的思想議題〉（上）、（下），收錄於《文學的位置》，頁1-17、174-236。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2009b。〈東亞啓蒙歷史過程中的民眾——談談日本的民眾史研究〉，《文化縱橫》第三十二期。
- 張承志。2009。《敬重與惜別——致日本》。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